

## 放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风筝”

■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哈亦琦(右)向北京师范大学捐赠“哈氏风筝”代表作“洪福齐天燕”

伴着春风仰望天空,雄鹰、蝴蝶、蜈蚣等各色风筝成了主角。清代诗人高鼎在《村居》中写道:“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放风筝,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也是从古至今人们踏青春游的一大乐趣。然而,又有几人真正了解过一只纸鸢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与内涵。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就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哈氏风筝”及其传承人引进了校园。

此次“哈氏风筝进校园”系列活动包括了哈氏风筝展、风筝主题书展、风筝史话讲座以及风筝制作体验活动,师生不仅可以到图书馆欣赏精美的风筝、学习风筝知识与文化、聆听风筝的历史与故事,更能体验风筝制作技艺,在春日放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风筝”。

## 让非遗走进校园

瘦燕、肥燕、鲑鱼、凤凰、桃福双全、钟拍子……走进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大厅,各色的“哈氏风筝”在书海中圈出了一片不一样的天地。“哈氏风筝”校园行活动开幕式还未开始,小小的展区就已经吸引了许多学生、教师前来参观、拍照。

“哈氏风筝”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秀代表,开展非遗进校园系列活动,是学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推进文化育人工程的重要举措。”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张凯说。

据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是北京师范大学自2018年起开展的系列活动,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大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体验和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哈氏风筝”已经不是第一个进入北师大校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之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津“泥人张”彩塑就已经走进校园。“泥人张”第六代传人、天津市泥人张世家绘塑老作坊坊主、天津市泥人张美术馆馆长张宇也以“东方语境下的艺术直觉”为题,为师生带来精彩讲座。

事实上,北京师范大学一直以来都是民间文化发展研究的重镇。

1949年,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大师钟敬文就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这里开辟了“中国民俗文化和民间文艺研究新领域,使其成为民间文学发展的沃土。而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也依然保持着弘扬、传承民间文化的初心。”

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专家全面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评审工作,助力“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系列活动外,2018年,“民间艺术大师进高校工作坊”和“民间文化教育指导委员会”也在北京师范大学挂牌成立,使学生能够通过工作坊的形式与大师面对面交流学习,并聘请两位皮影艺术大师为客座教授。

## 非遗保护传承的沃土

对于北京师范大学来讲,“哈氏风筝”不是第一个进入校园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对于“哈氏风筝”来讲,这却是第一次走进高校。

“这不仅是一次进高校,也是我第一次在境内举办个人展览。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扮演着非

常重要的角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沃土。在一些非遗传承人做不到的方面,高校可以作为一种补充。”“哈氏风筝”第四代传承人、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哈亦琦说。

在他看来,高校与中小学不同,其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求知欲都更强,不论是否学习相关专业,都需要不同文化艺术形式的滋养,“高校学生在非遗保护中,起着接受和传播的作用。在大学生这样的年龄段,了解非遗意义非常深远,学生学习得到不同的艺术形式后,会对其人生和职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许多民间艺术的技术精湛、生动有趣,过去发展之所以萎缩,还是因为保护宣传工作没有做到位,今天的很多年轻人对这些文化瑰宝很有兴趣。”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杨利慧告诉《中国科学报》,每次举办相关活动,前来参观的师生都络绎不绝。

在风筝制作体验活动上,学生们正在执笔、调色,为风筝图样填上独一无二的色彩。活动结束后,一位同学兴奋地告诉《中国科学报》,能够抢到风筝制作体验活动的体验券是“人品爆发”,由于体验券数量有限,很多学生都是在开幕式当天早早前往图书馆参与仪式,等待抢券的。

“北京师范大学是培养教师的摇篮,培养师范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和对民间文艺的了解,在学生走出校门后,可以在非遗保护、传承上发挥很大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民间文学研究所所长万建中说道。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尽管文学院场地紧张,还是专门空出一间教室作为工作坊,邀请民间艺术大师到工作坊来工作,让学生跟随大师学习、开展研究,并作口述史。

“此外,学校还聘请民间艺术大师为教授,这是在全国绝无仅有的。在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上真正具有发言权的是这些大师。以前我们更多的是走出去,现在要大力开展走进来的活动,让大师们进高校,这也是保护、传承民间文化的有力举措。”万建中说。

## 非遗传承的坚持与努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向来不易,一只小小的“哈氏风筝”背后,是几代人的心血与传承。

哈亦琦从小便随父亲学习家传风筝技艺,如今更肩负着“哈氏风筝”的发展与传承。在他的眼中,创新是“哈氏风筝”发展的重要方面之一。

“如今的社会,科技发展迅猛,有些东西社会和生活不再需要,一些文化就会自然消亡。我们在做的就是努力坚持,保留一些文化。”哈亦琦说。

早在十几年前,哈亦琦就开始重视起“哈氏风筝”的转向,在继承传统风筝再现、记载的基础上,开始制作文化创意产品。“在刚开始做这样的产品的时候,还没有文化创意产品这一概念。当时因为经常出国参加活动,看到国外的一些做法很受启发,回来后就思考我国众多传统文化符号应该怎样充分利用。”

从单纯的制作风筝,到制作融合“哈氏风筝”图样的现代家居产品、T恤衫、灯具等,传统的图案、符号创造出了符合现代人审美和需求的产物,这也成为“哈氏风筝”传承发展的助力。

然而即便如此,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依然存在。

同样作为哈氏家族一员,新一代“哈氏风筝”传承者,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哈老师”的哈亦琦坦言,如今“哈氏风筝”的师徒传承中,年轻人依然占少数。“哈氏风筝”几代人传承下来的内容,想象中容易做起来难,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最佳。但为生计考量,也需要有自己的职业,不能全职做风筝,这就耽误一些时间,难以全身心投入。”

“作为非遗传承人,我有时可能连吃饭、旅游、聊天的时间都没有,也会有枯燥和寂寞的时候,但是我有责任去坚持做这件事。我们现在所作的努力,是为了后人。希望即便二三十年后我们不在,也还有人能够看到‘哈氏风筝’的图谱和相关作品记载。”哈亦琦说。

除了传承人的努力与坚持,作为非遗发展、传承有利阵地的高校还能够做些什么?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列出保护非遗的一大措施是教育,各国对此也都十分重视。非遗萎缩的重要原因,一个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另一个就是代际传承出现危机。通过高校,我们可以很好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际传承,使精湛的技艺和背后所承载的人类优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能够通过学校教育实现代际的跨越。”杨利慧分析道。

在她看来,让非遗进入高校的课程体系是很重要的传承、保护方式。“现在有些高校已经在学校里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等相关的教程,我也在学校申报了一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希望能够把这些年参与国际层面上的合作工作经验、体会在课程设置中体现出来。”杨利慧说,一个常态化的学科设置和一些偶发性的展览、活动中相辅相成,才能让高校在非遗传承保护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对此,哈亦琦也表示:“高校在非遗进校园中是可以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进行的,持续一段时间后,形成体系,为学生接触、多方面了解各种民间艺术提供良好的环境。”

## 史海钩沉



宁恩承

■杨薇

## 宁恩承与东北大学董事会

当今,对于国内高校而言,“董事会”制度早已耳熟能详。然而,如果将时间上溯至20世纪初,这一先进制度在国内官办大学中还未有先行者。直到1931年4月,张学良主政下的东北大学开东北官办大学之先河,率先成立了董事会。而这一制度的创新,又与一个人的建议密切相关。

他就是时任东北大学秘书长、代理校长宁恩承。

1901年,宁恩承出生于东北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期,他求学奉天(今沈阳市),并于1924年,由张学良亲自资助赴英留学,先后求学于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29年,宁恩承学成回国,历任沈阳辽业银行总稽核、华北四省税务局局长、财政部顾问、中国农业银行总稽核、沈阳地和公银行总经理等要职。

1930年12月,张学良先生调任宁恩承担任东北大学秘书长,并代理校长职务。此时,宁恩承还未到而立之年。他自觉不堪重任,几经请辞。最后还是在恩师张伯苓的鼓励帮助下接了重担,此后,便在白山黑水间书写了一段新的传奇。

在东北大学任职期间,宁恩承曾提出“教育是百年树人,大学是千年的事业”,要办千年的事业,就要征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这也就成为宁恩承力主成立校董会的初衷,即请“对于大学的发展有正确的见解,有远大的计划的社会各界名人,参加学校的管理,为学校发展出谋划策”。张学良非常赞同宁恩承的见解,并立即召开拟聘担任校董会董事的名人、学者的名单。

由于当时中国各官办大学均无校董会的组织,东北大学首届校董会成立时,叫作“东北大学委员会”,张学良亲任委员长,章士钊、张伯苓、汤尔和、罗文干、宁恩承、金毓麟、臧式毅、王树翰、肖纯锦、王卓然等为委员。这些成员中,既有学识渊博的学者,又有办大学经验丰富的名人,还有本地手握重权的官员,这是一个“知识与权力配合”的大学委员会。

委员会共同制定了《东北大学行政管理委员会章程》,使得东北大学决策民主化、管理制度化、行政效率化。学校的重要事务和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校董会民主商讨,校董会成为东北大学的智慧核心。此举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倡导成立大学委员会只是宁恩承当时在东北大学施行新政的重大举措之一,此外,他还针对学校当时的状况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是整理校务。宁恩承严明校规校纪,完善制度建设,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教学质量。半年之内,使得东北大学各项工作安排井然有序,教学和科研得以井然有序地进行,校舍整齐,窗明几净,整个东北大学焕然一新。

其次便是整顿校风。当时的东北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位院长作风不正,行为荒唐,竟然在大学校园内公开聚赌,甚至为还赌债,不惜私吞教授薪水,行径恶劣。得知此事,宁恩承勃然大怒,但考虑到此人为一院之长,为顾全大局,经过与张学良商讨此事后,决定低调处理此事,劝说该院长主动辞职,以正风纪,保全学校声誉。教育学院院长去职后,宁恩承号召全体师生引以为戒,东北大学校风大振,从此学校里只闻琅琅书声。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大学被迫内迁到北平。1934年10月,东北大学委员会得以重组,新委员中的很多人是国民党的高官,张学良聘任这些人作为东北大学委员会委员,目的是使颠沛流离中的东北大学得到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

抗战胜利后,东北大学得以重回故土,迁回沈阳。1950年8月,东北大学更名为“东北工学院”。然而“东北大学”这四个字不只是一所高校的名字,更是一个见证历史的名字,东大人的精神早就深深烙印在这四个字里,它也代表了中华民族那段苦难的岁月。为此,改革开放后,已移居美国的宁恩承先生多次回国,为东北大学复名奔波劳累。

为了继承并发扬东北大学的优良传统,在原国家教委批准东北大学复名后,学校领导立即着手组建东北大学校董会的工作,决定聘请张学良出任东北大学名誉校长和校董会名誉主席,并于1996年6月,举行了东北大学复名后的校董会成立大会。

半个世纪后,宁恩承回顾东北大学历史发展时,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大学委员会实际上是董事会或校董会,是东北大学的建树。在无声无臭中成立校董会,许多人不知有如此大的建树,而看一般人们见人形是手足行动,嘴脸表情,而不见脑筋的活动一样。真正指挥手足嘴脸动作之源是脑筋。”宁恩承把“大学委员会”视为大学中真正的“脑筋”,充分肯定了它的地位和作用。

宁恩承百年后,他的妻子捐资60万美元,资助修缮东北大学图书馆。东北大学在2003年举行80周年校庆期间,正式将图书馆命名为“宁恩承图书馆”。为了纪念这位世纪老人,东北大学将宁恩承的塑像树立在宁恩承图书馆广场上。宁老依旧那么慈祥,注视着东大莘莘学子,他在这里继续诉说着东北大学的历史,见证着东北大学的未来。(作者系东北大学宁恩承图书馆馆员)

“每当看到夜晚的小楼灯火通明,思绪就会回到多年前,排灌机械团队上下齐心谋发展、搞建设的那段岁月。”在江苏大学主教学楼——三三小楼右侧,两栋小楼掩映在茂盛的梧桐树间。小楼名副其实,一栋两层,另一栋三层,走进小楼,颇带时代气息的水磨石地板、鹅黄色木桌椅诉说着历史。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该校的排灌机械团队用积攒的科研经费修建了这两栋小楼。一栋修建于1983年,花费23万元,另一栋修建于1995年,花费55万元。在那个年代,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的需要与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拔地而起的两栋小楼,记录下的一代代科研工作者催人奋进的创业史。

## 源于使命担当

说到小楼,离不开追溯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学科的前世今生。

1959年,时值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严重下降。为解决我国农业旱涝保收的问题,著名排灌机械专家戴桂蕊多次调查全国排灌机械生产和使用情况,向原国家科委和原农业机械部递交报告,建议成立排灌机械的研究机构和相关专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亲自批示,原农业机械部实施,在吉林工业大学试办排灌机械专业,建立排灌机械研究室。

得知排灌机械专业和研究室可能南下的消息,时任镇江农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陈云阁求贤若渴,立刻亲自带队到长春向戴桂蕊伸出了“橄榄枝”。

1963年,原农业机械部决定将吉林工业大学排灌机械专业及排灌机械研究室建制转入镇江农学院。戴桂蕊带领一干专家人才,包括教师、科研人员、六级以上工人和一个班的学生等100余人迁到镇江。

学校发展初期,基建经费十分有限。“当时,办公用房非常紧张,全校所有行政机关都挤在一栋小楼的三层楼里,卫生间曾在楼里‘安过家’,真正是‘一楼多用’。”原排灌机械研究室负责人金树德回忆,“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学校毅然腾出行政楼的第三层供排灌机械研究室独立使用。”

由此,镇江农学院艰苦奋斗的创业序幕徐徐拉开。



曾经的流体楼

## 小楼创业史

■本报通讯员 高雅晶 吴奕 记者 温才妃

## 创业之路,苦中作乐

20世纪70年代,北方上百个城市缺水情况严重,农业耗水量很大,研究室再一次看到发展机遇,时值水利部等八部委发文开展节水灌溉技术研究,在国家水利部门的支持下,在镇江农学院成立了全国联合设计组,开始节水灌溉技术研究。

创业的日子总是难忘。当时的联合设计组集中了各省市20多个工程师代表,在校园的稻田中做喷灌试验。风速是一项影响试验参数精度的重要因素,镇江地区只有凌晨1点左右的风速才满足试验要求。因此,夜晚寂静的校园里,领导干部带头,老师们、工程师们每人配齐

一件雨衣、一双雨靴,待在办公室静待适宜的时机,一到点便冲进农田争分夺秒地开展试验。

经过一年多研究,联合设计组在1978年研制成功中国的PY1喷头系列,并在当年获得全国机械工业科学大会奖。基于喷头研究取得的重大突破,全国200多家工厂纷纷前来领取图纸。当时校园里,车马多是奔着排灌机械研究室而来。

在节水灌溉领域的全国领先地位,进一步扩大了研究所的影响力和知名度。1981年,研究室获批扩大为研究所,编制从35人增至50人。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结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研究所又迎来第三次发展机遇。当时农村只有适合大面积灌溉的排灌设

备,不再符合包产到户的个体需求。《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报道,讲述了石家庄一名妇女背着孩子跑到沈阳水泵厂购买家用水泵的故事,这给他们新的启发。他们将全国重要工厂的技术人员集中到学校,开发研制小型潜水电泵和微型泵,设计的系列产品很快投放到市场,深受农民欢迎。

至此,研究所归口的节水灌溉和潜水电泵两个研究方向一炮打响,成为全国知名的研究中心。

## 在传承中阔步前行

研究所发展规模逐步扩大,办公面积捉襟见肘。上世纪80年代初,研究所决定在原行政楼的西南侧修建办公场所,从结余的科研经费中拿出了23万元。历时一年多建设,1983年,1000平方米的两层小楼建成,这也成为当时校园里最豪华的楼栋。

名为“排灌楼”,实际上,学校的重要会议都集中在小楼二楼的会议室召开。小楼的办公室布局也是精心安排,研究所领导班子以身作则,南面办公室都作为科研人员办公室,北面办公室才留作领导办公室。工作之外,小楼的业余生活也同样鲜活,逢年过节教师家庭聚会、新教师结婚新房过渡……互相扶持、彼此照应让这个团队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除了改善办公场所,实验室建设也是研究所自给自足。搭建大泵研究试验台的20多吨钢材原料在计划经济时期非常紧缺,研究所提供技术服务时,便收取企业的部分钢材指标为酬劳,一点点积攒起来所有的钢材原料。试验台全部自行设计、加工和安装,最终将试验台装配成功并达到国家标准。

20世纪90年代初,江苏大学在排灌机械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流体工程中心,下设流体机械、排灌机械、环境工程、质量工艺四个研究方向的研究所。1995年,发展最为迅速的流体机械研究所花费55万元建成一栋大约1500平方米的三层小楼,作为流体所新研究基地。

漫漫六十载,在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下,由排灌机械研究室发展而来的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学科成为国家重点学科,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为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研究中心,拥有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流体机械及工程试验条件和设备,在全国同类学科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